

【专题: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新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盛 斌 魏 方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规模增长、结构升级、主体多元化、市场拓展等辉煌成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中心和贸易大国。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从最初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保护贸易政策,经过渐进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演变为目前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在此期间,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呈现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政策体系从边界措施到规制融合、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转变的特点。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在未来对外贸易发展中需要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增进贸易新产品与新业态、加强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以及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

【关键词】对外贸易;贸易自由化;全面开放;贸易强国

【作者简介】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魏方(通讯作者),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116023)。

【原文出处】《财贸经济》(京),2019.10.34~49

【基金项目】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自主选题项目“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构及中国的角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间品进口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18YJC79017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不平凡的70年。在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徘徊后,中国准确把握住20世纪8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通过改革开放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凭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胆尝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持久努力,在21世纪开辟了崭新的局面,逐步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新挑战与新征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梳理分析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经验,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和挑战进行展望。

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阶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总体上经历了规模从小到大、结构从劣到优、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市场从周边到全球等跨越式改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下本文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历程分为7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

(一)1949-1957年:恢复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的指导下,与对外贸易相关的制度和机构陆续建立,对外贸易业务也由此开始恢复,尤其是“一五”(1953-1957年)期间,伴随着国内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如表1所示,1950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仅为11.35亿美元,而1957年迅速增长到31.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

为15.45%,其中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率为16.39%,高于同一时期世界出口总额增长率(9.19%)。与此同时,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在1956年由负转正,扭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6年的贸易逆差局面,首次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

从商品结构来看,由于受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出口商品一直以初级产品为主,到1957年初级产品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仍高达63.6%,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仅为36.4%,而且其中将近3/4是轻纺工业产品。中国进口商品则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等生产资料为主,“一五”期间其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的比重始终处于91.6%以上。从主体构成来看,1950年私营企业承担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占33.5%,之后随着

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国营企业逐渐在中国对外贸易活动中退出,到195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全部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从市场分布来看,由于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敌对、孤立甚至封锁禁运,我国内地贸易的市场主要是中国港澳地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与部分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瑞士等)也有小规模的贸易往来。

(二)1958-1977年:曲折发展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阶段,国内“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加上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经了曲折与徘徊。如图1所示,1958-1970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十分有限,其中出口总额年均1.11%的

表1

1950-1957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	
	总额	差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总额	增长率
1950	11.35	-0.31	—	5.83	—	5.52	—
1951	19.55	-4.41	72.25	11.98	105.49	7.57	37.14
1952	19.41	-2.95	-0.72	11.18	-6.68	8.23	8.72
1953	23.68	-3.24	22.00	13.46	20.39	10.22	24.18
1954	24.33	-1.41	2.74	12.87	-4.38	11.46	12.13
1955	31.45	-3.21	29.26	17.33	34.65	14.12	23.21
1956	32.08	0.82	2.00	15.63	-9.81	16.45	16.50
1957	31.03	0.91	-3.27	15.06	-3.65	15.97	-2.92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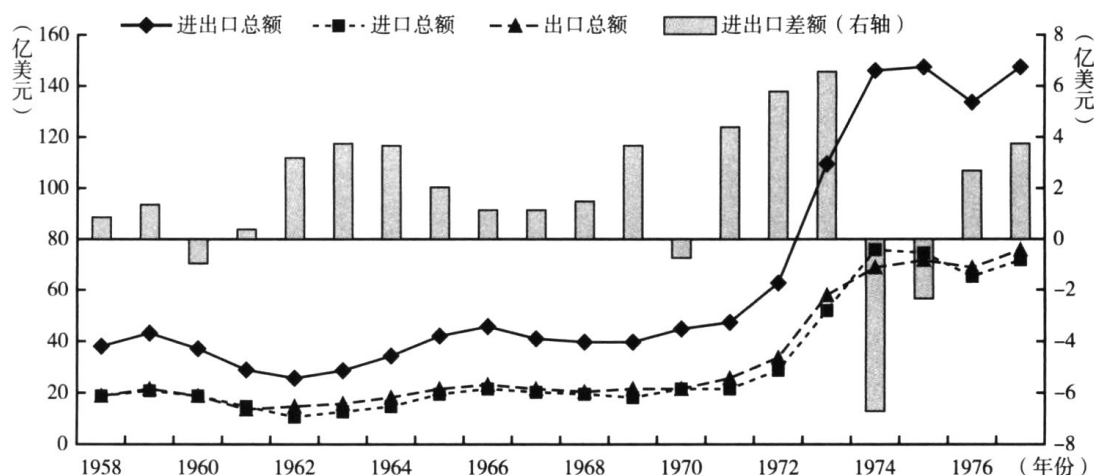


图1 1958-1977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增长率远远低于世界出口总额年均9.29%的增长率。这期间,“二五”(1958-1962年)规划中“大进大出”的外贸方针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年)虽然带来了贸易额扩张,但也非常短暂。1971-1977年,中国利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契机使对外贸易实现了一定的增长,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48%。总的来说,中国对外贸易在1958-1977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3%左右,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58年的1.82%下降至1977年的0.67%,这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从商品结构来看,1958-1977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依然占据半壁江山,工业制成品占比逐步提高到1977年的46.4%,但是其中将近3/4始终是轻纺工业产品;进口商品依然是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为主。全部进出口贸易业务继续由国营外贸公司垄断经营。市场分布的变化较为明显,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和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逐渐取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

(三)1978-1991年:改革探索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宏伟进程,中国一方面积极顺应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主动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另一方面不断探索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飞地”经济试点,开展贸易承包

经营责任制、海关特殊监管区、外汇“双轨制”等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发展由此进入新篇章。如图2所示,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至1991年的1356.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6%,高于同一时期世界贸易年均8.3%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0.75%提高至2%,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由0.85%提高至1.74%,贸易地位有所提升。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出口贸易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占比在1981年首次超过初级产品,并且自1986年起持续提升至1991年的77.5%,实现了出口比较优势的第一次重要转型升级。对外贸易主体构成也突破单一,由国营公司的垄断经营实现了多元化,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经达到21.34%,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高。市场分布进一步扩展至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中国建立了经贸往来,美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贸易发展中的地位越发重要。

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最大的特点就是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生产模式,从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加工贸易常见的方式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无论是开放初期的纺织、服装、玩具、箱包等产品,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机械设备、电子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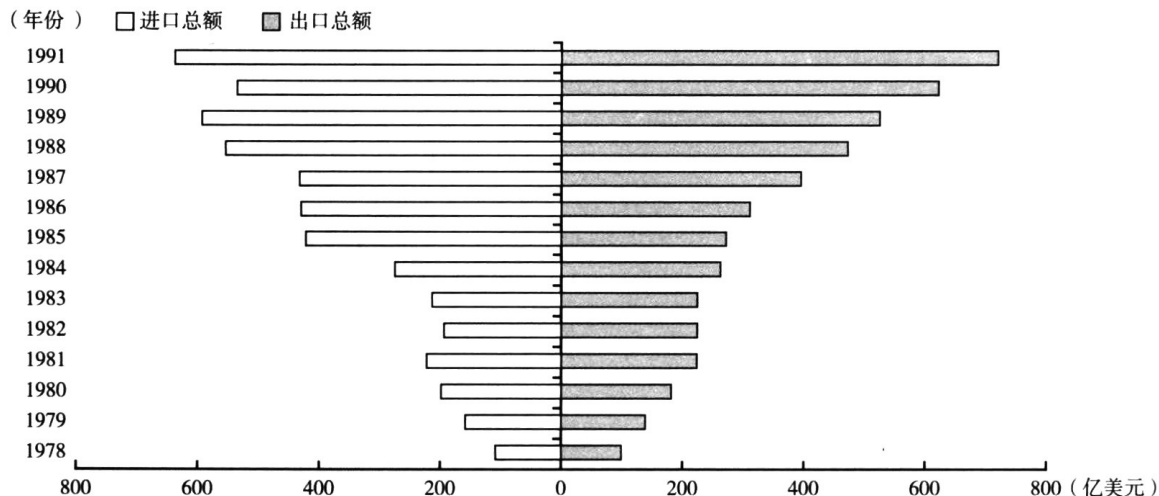


图2 1978-1991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

品、家用电器等行业,都充分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资源禀赋优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到199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42.3%,较10年前增加了将近37%。与货物贸易相比,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缓慢,1982-199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10.7%,其中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7%和12%,均低于同一时期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增速,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处于0.4%~0.8%。^①

这一时期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与试错阶段,诸多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实现重大突破,一些西方国家对改革开放政策的长期性有所质疑,在中国“复关”问题上设置了重重障碍(屠新泉、姜承蓉,2018)。因此,总的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还没有真正完全地与世界市场和全球体制接轨。

(四)1992-2000年:开放突破阶段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贸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始加速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外贸法律制度相继出台、外贸经营权不断放开、关税水平大幅降低、人民币双重汇率实现并轨等一系列改革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注入了更鲜活的动力。在此期间,货物贸易规模以年均14%左右的速度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743亿美元,是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23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6%,位列全球第七。同时,贸易逆差自1994年彻底扭转。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制

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商品中的占比将近90%,其中机电产品增速最快。出口市场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美国自1999年开始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这期间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特点是贸易主体的结构变化(见表2)。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占比在1998年超过国有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力量。外资企业的影响在加工贸易中尤为突出,这体现在其加工贸易进出口在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由1992年的39%和45%提升至2000年的71%和74%(Feenstra和Wei,2009)。外资企业通过投入资金、先进技术、中间投入品等与中国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纷纷将中国作为生产与出口加工平台,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这一时期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快于货物贸易,1992-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83.15亿美元增加至660.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4%^②,但总体规模仍然不大且逆差严重。旅游和运输服务一直占据着中国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通信、金融和娱乐服务新兴服务业的占比极低。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深化发展主要得益于对当时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外贸体制比照国际规则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这与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密切相关。随着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由1992年的33.4%提升至2000年的43.9%,出口每增长10%能带动中国GDP增长1%(林毅夫、李

表2

1992-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主体构成情况

单位:%

企业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进出口	国有企业	72.5	64.0	61.4	58.6	49.9	50.3	48.4	47.9	45.4
	外资企业	26.4	34.3	37.0	39.1	47.2	47.0	48.7	48.4	49.9
	其他企业	1.0	1.7	1.6	2.3	2.9	2.7	2.9	3.7	4.7
进口	国有企业	65.3	57.4	52.1	49.5	42.6	42.8	42.8	44.8	43.9
	外资企业	32.8	40.2	45.8	47.7	54.5	54.6	54.7	51.8	52.1
	其他企业	2.0	2.3	2.1	2.8	2.9	2.6	2.5	3.4	4.0
出口	国有企业	79.4	71.1	70.2	66.7	57.0	56.2	52.7	50.5	46.7
	外资企业	20.4	27.9	28.7	31.5	40.1	41.0	44.0	45.5	47.9
	其他企业	0.2	1.0	1.1	1.8	2.9	2.8	3.3	4.0	5.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2-2000年)计算得到。

永军, 2003), 而引进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管理能力等创造性资源正是推动中国产业与贸易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江小涓, 2002)。不过,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十分严重, 1992–2000 年全国总出口的 40% 左右一直集中于广东, 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占比一般在 4% ~ 10%, 内陆省份的出口占比仅为 1% 左右, 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沈坤荣、马俊, 2002)。

(五) 2001–2007 年: 全面深化阶段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通过进一步清理修订外贸法规、削减关税、开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措施履行入世承诺, 同时享受 WTO 成员间贸易自由化的成果, 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天地。货物贸易规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爆炸”式增长, 短短 6 年间货物进出口总额由 2001 年 5096.5 亿美元飙升至 2007 年的 21765.7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 27.4%, 超出同期全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 7 个百分点。这期间中国快速成长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贸易结构更加优化, 进出口贸易的制成品商品中除传统机电产品外, 高新技术产品开始崛起。贸易主体继续由外资企业主导, 但民营企业的贡献不断加大。贸易市场的分布实现全球化, 以亚洲和北美洲为主, 同时对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增长明显。

入世之后, 中国服务贸易在世界的地位显著提升, 2007 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额的世界排名分别由 2001 年的第 12 名和第 10 名上升至第 7 名和第 5 名, 但逆差依然存在。旅游和运输服务仍占据较大比重, 咨询、计算机和信息以及金融服务的增速较快。

入世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互利共赢的双向开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 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发展差距等问题以及对 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同时贸易顺差持续扩大, 给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币值稳定、贸易摩擦等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里重点分析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奇迹”所引发的对中国贸易增长方式的探究。根据新

贸易理论, 可将一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两条路径, 前者指出口产品规模的变化, 后者指出口产品种类和市场的变化。根据测算, 1992–2005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增长主要依靠集约边际, 扩展边际的贡献最多不超过 15%(Amiti 和 Freund, 2008); 中国在多边层面上的出口增长亦大体如此, 1995–2005 年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达到 94.06%, 扩展边际仅占不到 6%(钱学锋、熊平, 2010)。如果进一步将集约边际分解成出口产品数量的变化和价格的变化, 1995–2004 年中国出口增长中数量扩张的贡献为 76.6%, 价格的贡献较小(李坤望, 2008)。基于更精准测算方法的系列研究也发现, 入世后的几年, 特别是 2001–2002 年, 大量低质量的企业开始出口, 造成了中国总体出口产品质量水平下降(余森杰、张睿, 2017; 施炳展, 2014)。中国对外贸易增长严重依赖“以量取胜”而非“以质取胜”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很容易受到外部需求变化、贸易保护主义、成本上升的影响而十分脆弱, 在中长期是不可持续的。

(六) 2008–2012 年: 调整与转型阶段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面对外部需求的严重萎缩, 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 2009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 13.9% 的负增长, 同比减少了 3557 亿美元, 其中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 同比减少 2991 亿美元, 增长率为 -16%。中国出口扩张高度依赖数量扩张的脆弱性在金融危机中彻底暴露, 2008–2009 年集约边际对中国出口贸易大幅缩减的贡献高达 96.6%(盛斌、吕越, 2014)。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给外贸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中国迅速采取了调高出口退税率、促进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激励措施, 使中国对外贸易得以较快恢复增长, 2010–2012 年连续 3 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但是在后危机时代, 中国的外贸增速已有所缓和, 2008–2012 年中国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分别为 12.6% 和 9.4%, 虽然仍高于世界同期的 3.1% 和 3.4% 的增长率, 但已远低于入世后全面深化阶段 25.6% 和 28.9% 的增长率。

尽管中国贸易规模增速趋缓, 但贸易结构依然

有所优化。一方面,进出口商品继续由机电产品 and 高新技术产品主导,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占比持续扩大,贸易市场分布中美国的占比有所下降,东盟的占比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由2008年的46.4%提升至2012年的48.2%,这期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则由47.3%下降至42.1%,一般贸易出口额在2011年实现了对加工贸易出口额的超越;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指数由1995年的2.535提升至2011年的2.819,表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应中间投入品的能力在增强(Antras 和 Chor, 2017)。此外,2008–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率为12.5%,高于货物贸易10.8%的增长率,但服务贸易逆差有所增大。

(七)2013年至今: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3年中国开启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对外贸易发展进入新时代。至今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的地位,并于2014年超越美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贸易增速虽仍趋缓(甚至在2015年和2016年又出现了负增长),进出口额在2013–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8%和2.4%,但依然高于世界同期0.8%和0.5%的低增长率(见图3)。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保持规模优势的同时,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与改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商品综合竞争新优势不断提升,逐步替代了仅仅依托劳动力资源优势从事国际产业分工的加工装配环节,促进了对外贸易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例如,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继续上升,由2013年的49.2%提升至2018年的56.3%,这期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则由38.9%下降至32.1%,而且一般贸易出口额领先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差距逐年扩大。此外,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由2013年的79.7%提升至2016年的83.4%^③,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供应中间投入品的能力持续增强,2017年彻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的核心(Meng 等, 2018)。二是积极开拓新市场合作空间,这突出体现在近三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额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5.1%提升至27.4%,年均增长15.7%,高于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这对于分散市场集中风险、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至关重要。三是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占比有所下降,由2013年的46.1%下降至2018年的42.6%,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占比在2018年首次超过50%,对中国外贸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四是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8%,至今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二大服务贸易国的地位,但是贸易逆差依然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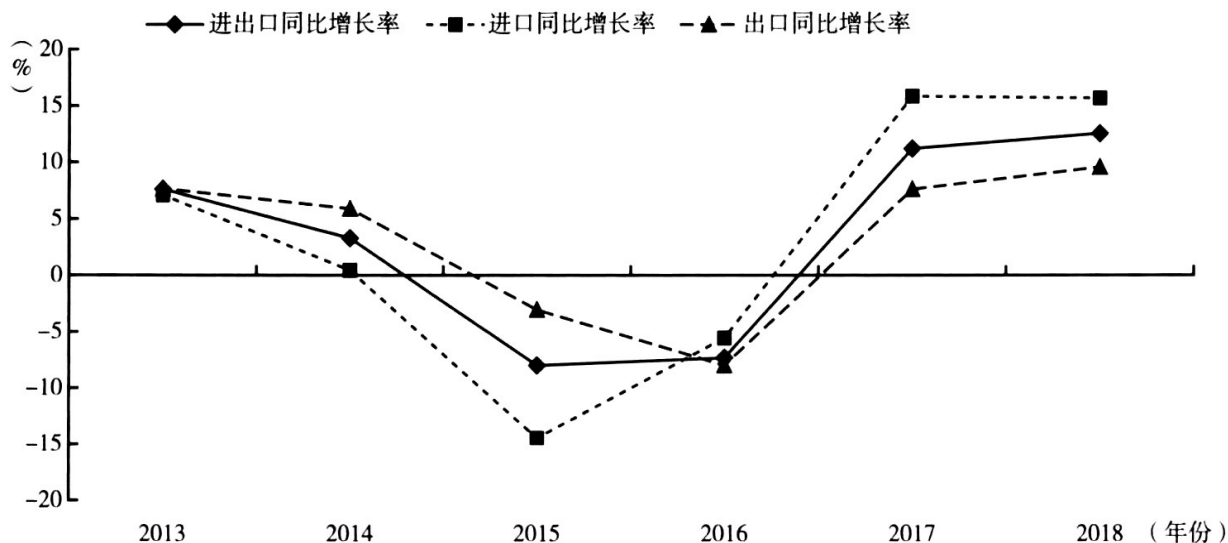


图3 2013–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总的来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已经从以往的规模扩张转变为现今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已形成高水平开放的新格局,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出更辽阔的空间。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得益于新型国际生产体系变迁和融入多边贸易体制等良好的外部时机和条件,更离不开国内市场导向的一系列外贸体制机制改革。下面对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进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1949—1957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建立

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④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的基本经济政策。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进一步明确了新中国“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1950年12月,《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和《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颁布,随后《进出口厂商申请营业登记办法》《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涉及经营主体、贸易方式、商品许可、外汇结算等事务的外贸管理法律陆续出台,全国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体系逐渐成形。

在计划性外贸政策的指导下,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中央贸易部,下设对外贸易司主管对外贸易,1952年中央贸易部拆分成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后者作为国家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海关总署、商品检验总局和中国对外贸易促进会等许多外贸管理部门也先后成立。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进出口贸易政策,1953年对外贸易部设立了14个专业进出口公司和2个专业运输公司,并逐步在地方开设分公司,还采用了多种方式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国基本建立了高度集中、政企合一的外贸经营体制。

保护贸易政策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对外贸易必须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因此由国家统一计划整合优势资源进行出口创汇,进口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料等,严格管理外汇使用,对消费品设置高关税,对国内不能生产的设备、原料等设置低关税或免税。这是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典型模式。

(二)1958—1977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保护贸易政策的演进

从整体看,自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继续坚持保护贸易体制和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同时依据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而在具体实施措施上有所调整。例如,关于外贸经营权,50年代末为了配合“二五”计划特别是“大跃进”,外贸部门要求“出口上要多收购、大出、快运、多收汇,进口上要大买、快买、快运、快交货、节约外汇”,^⑤在“大进大出”方针的指引下,出口物资收购、进出口计划编制等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导致有些口岸和公司相互争夺客户与市场的不当竞争,对此国家随后又收回了下放的部分外贸经营权。再如,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导致双边贸易急剧萎缩,国家的技术和设备进口计划逐渐向西方国家倾斜,并陆续与西欧多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经贸往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极左”的影响而出现剧烈波动。进入70年代,中国利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国内对“极左”进行反思带来的契机,进口了一批较先进的成套设备,带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二次高潮。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建立了一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贸易体系,主要包括进出口计划、外贸经营权、国营贸易、进口保护、外汇管制。所有的进出口活动都要以指令性计划为依据,这导致企业无法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缺乏自主性与灵活性,难以发挥资源禀赋优势,使贸易真正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此外,进口保护壁垒很高,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的算术平均关税水平高达52.9%,其中制成品关税为47.7%,之后一直未有大幅度削减,而1979年东京回合结束时,世界

上9个主要工业国家制成品关税平均已降至4.7%。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就对建立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来料加工贸易等进行过初步设想,虽然未能付诸实践,但是对后来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作用(裴长洪,2009)。

(三)1978-1991年:兼顾进口保护和出口鼓励的开放贸易政策

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第一,打破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贸体系,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到地方和生产企业,减少和简化指令性计划,鼓励开展工贸结合和进出口代理制,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外汇“双轨制”,有效激发了外贸企业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第二,建立经济特区,1980年首先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通过实施外资、税收、土地、外汇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外资企业进驻园区,为学习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工业和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的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⑥第三,开放沿海城市,1984年率先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1988年进一步将杭州、南京、沈阳等140个市县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1990年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设立中国第一个海关特殊监管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随后还在一些沿海、沿江和省会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这期间国家为顺应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展加工贸易,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其探索出越发成熟的制度保障体系。1979年国务院颁布《以进养出试行办法》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海关总署等外贸部门据此制定了有关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加工贸易在资格审批、外汇使用、征税纳税、保税监管等方面的优惠。无论是“三来一补”还是进料加工贸易,都为充分发挥国内劳动

力资源优势提供了生产与贸易平台,增加了出口收汇,更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除了加工贸易政策之外,出口鼓励措施还体现在外汇留成、出口退税、出口奖励、人民币汇率贬值和对出口导向型外资给予特别优惠等多个方面,同时也更加强调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推行出口鼓励政策的同时,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发展而继续坚持进口替代保护政策,几次关税制度调整基本调低了国内不能生产或短缺的设备、零部件、原料等的关税,同时调高了国内已经具备生产能力的制成品、机械设备等的关税。到1991年中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仍在40%以上,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未有大幅度下降。

(四)1992-2000年:出口导向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党的十四大拉开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序幕,外贸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始加速推进。在外贸经营主体方面,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科研院所陆续获得自营进出口权,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改组国营外贸企业,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逐步取消出口财政补贴,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在外贸法制建设方面,采用国际通用标准修订实施新的进出口税则,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4年),首次对外贸经营者、货物与技术进出口、服务贸易、贸易促进、贸易救济等进行系统性的法律法规规定。在出口鼓励措施方面,专门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为进出口贸易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利用财政资金设立基金或协会,资助扶持中小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和出口商品管理制度等,更有效而规范地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在外汇制度方面,1994年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

这期间,为加快对内市场化与对外开放(尤其是入世和参与APEC)进程,中国进行了持续的大幅度进口贸易自由化改革。一方面,削减关税,从1992年1月开始取消全部进口调节税,实施大幅度自主关税减让,到1996年中国的简单平均最惠国进口关税率从42.1%降至23.7%,加权平均最惠国进口关税率从

32.2%降至19.8%(见图4);1997年重点降低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关税,1998年开始连续4年按照《中美纺织品与服装协定》减让相关产品关税,1999年重点降低在APEC内承诺的玩具和林产品关税,到2000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17.0%,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14.7%,减让幅度分别达到60%和54%,均高于乌拉圭回合设定的所有参加方关税平均减让33%的谈判目标。不过,即使如此,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是相对偏高的,2000年GATT发达成员的平均关税税率为3.8%,发展中成员的平均关税税率为12.3%。另一方面,中国加快规范和削减非关税措施,通过出台《一般商品进口配额管理暂行办法》《进口商品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大幅度减少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简化、优化进口程序,并使贸易管制的透明度有很大提高。

(五)2001-2007年:履行入世承诺的贸易自由化政策

入世后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市场,切实履行入世承诺,对外贸易政策对标国际规则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外贸经营主体方面,2004年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企业和个人均可依法获得外贸经营权;仅对少数重点商品实行国营贸易,还提高了国营贸易进出口程序的透明度。在外贸法律法规

体系方面,入世前3年根据WTO规则和入世承诺集中清理修改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废除了其中800多项;^⑦公布所有与外贸有关的法律法规,设立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局(现为商务部WTO司),使贸易政策进一步公开透明;2004年修订《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形成更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救济体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根据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TRIPs)协定》,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有关的知识产权法规进行修订,新颁布实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专门性保护法规,基本形成了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⑧

中国货物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十分显著。如表3所示,中国进口商品的简单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从2001年的15.9%降至2007年的9.9%,加权平均最惠国关税税率从2001年的14.1%降至2007年的5.5%,已经低于一些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尤其是制成品关税的减让幅度达37%以上,无论是简单平均关税税率还是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到2007年均低于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初级产品关税也大大低于印度和墨西哥。中国入世时关于汽车与零部件、纺织品与服装、信息技术产品等的关税减让承诺已经全部履行完毕。与此同时,中国自2005年起取消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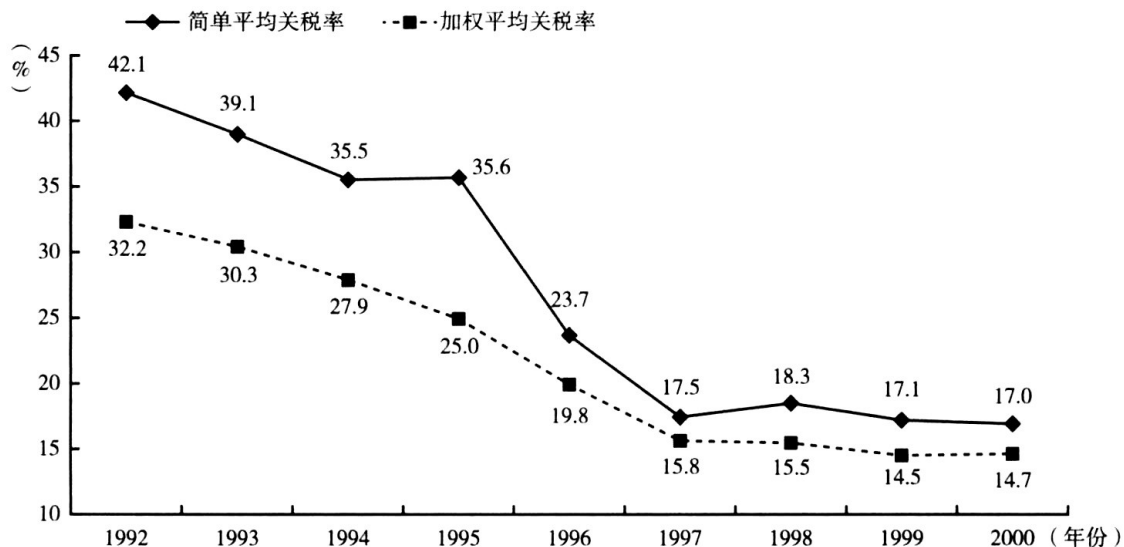


图4 1992-2000年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1995年的数据来自吴家煌(1998),其他数据来自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8)。

表3

2001-2007年中国总体与分部门进口商品关税水平变化与国别比较情况

单位:%

年份	所有商品		制成品		初级产品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简单平均	加权平均
2001	15.9	14.1	15.4	13.0	17.8	19.2
2002	13.1	7.7	13.0	8.1	13.7	6.1
2003	11.4	6.5	11.0	6.7	12.5	5.7
2004	10.5	6.0	10.2	5.9	11.7	6.2
2005	9.8	4.9	9.6	5.4	10.7	3.6
2006	9.9	4.4	9.5	4.7	11.1	3.7
2007	9.9	5.5	9.7	6.4	11.2	3.3

其他发展中国家(2007年)

巴西	12.2	8.6	13.3	11.1	8.7	2.8
印度	17.2	12.0	14.0	11.0	27.8	13.0
墨西哥	12.5	11.4	11.6	10.0	15.9	17.4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8)。

施,根据WTO规则,仅对涉及环境保护和生命安全的产品实施进口限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中国的入世承诺涵盖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列表中12个大项160多个部门中的9项100多个部门,开放程度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盛斌等,2011);在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业部门中设置的地域限制、股权比例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按照承诺到2006年基本取消,大大降低了国外服务提供者的市场准入门槛。

(六)2008-2012年: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调整政策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迅速调整了对外贸易政策,重点针对稳定与扩大出口。出口激励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和出口信贷力度,清理出口各环节收费,取消或降低包括农产品、化肥、钢铁等商品的出口税,调高出口退税率,支持企业“走出去”以带动出口,促进以海关通关服务为主的贸易便利化,积极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等对外贸易新业态等。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进口保护措施,如取消部分商品的临时优惠关税税率、增加自动许可的商品清单等(盛斌等,2011)。但总的来说,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并没有因危机而停止,尤其是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在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上进一步履行了入世承诺。

这期间,在制定“稳外需、保市场、保份额”外贸措施的基础上,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调整结构和纠正失衡。2012年4月商务部印发《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中国外贸发展以“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为重点,为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贸易强国进程指明了方向。随后,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提出将积极扩大先进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作为外贸发展的一个基本任务。总的来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响应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强调外贸发展的协调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七)2013年至今: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高水平、全方位开放政策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重点举措包括:深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创立与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参与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与新议题谈判等。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具体目标与内容,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5年10月)勾勒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蓝图和愿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开放”的新思想、新理念与新战略,为中国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和路线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政策框架与体系。

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主动扩大货物进口。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增加进口”,2014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8年中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7.5%。这些都表明,中国贸易开放的重心进一步转向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成为全面开放的重要目标。通过进口低成本、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投入品,企业能够显著提升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促进产品创新,更好地融入全球或区域价值链。第二,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不仅有根据WTO电子支付服务争端的裁决结果、开放国内银行卡清算服务市场的“倒逼”式开放,更有在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投资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实施的先行先试的“主动式”开放。第三,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2019年),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对外资的促进和保护。第四,在开放模式方面,已分批建立19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多的对外开放、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政策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成熟后向全国复制、推广,同时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和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更高层次的贸易开放。第五,在区域贸易合作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中日韩自贸区等是中国构建高标准FTAs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中国引领国际新型经贸合作的重大经贸举措,至此中国形成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近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贸易质量的提升。2012年《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将“巩固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写进指导思想,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而十九大指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上也要求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利用“一带一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促使出口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先进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进口,鼓励外资来华设立研发中心,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全力提升中国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化质量意识,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在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由封闭向开放演进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经了种种坎坷与辉煌,充分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不断探寻高质量外贸发展道路与方式的积极实践,以下从四个方面对70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实践的特点与经验进行总结。

(一)贸易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

虽然并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明确指出宏观上中国实施的是何种贸易发展战略,但我们仍可从贸易政策演进与贸易绩效变化中定性判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对外贸易领域的种种举措都表明中国实施的是进口替代贸易发展战略,尽管严格控制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但遏制了对外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活力,使中国贸易规模在世界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的设立、沿海城市的开放、外商投资的流入、加工贸易的兴起均带来了中国出口规模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优化升级,但囿于相对落后的工业发展体系,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仍保持着较高的进口壁垒,贸易发展战略呈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特点。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刀阔斧地对外贸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入世后按时履行减让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等一系列进口自由化承诺,中国市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更激发了巨大的出口潜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至此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已经转为出口导

向,同时还在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经贸战略、以质取胜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和科技兴贸战略,促进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贸易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中国的贸易发展战略亟须转变,当前更加强调贸易平衡,实现贸易中性。无论主动扩大商品进口,还是服务业和外资的进一步开放;无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合作的深化,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均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越来越注重与世界共享成果,实现互利共赢。即使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依然强调通过贸易自由化向世界宣示继续扩大开放的立场、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的决心和与世界其他国家同享“中国红利”的包容。

(二)贸易发展目标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

目前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贸易大国。根据WTO的统计,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622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出口总额为2487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8%,位居第一;进口总额为21359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0.6%,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但是已有众多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于重视“量”而忽视“质”,比如,中国成长为贸易大国主要通过高数量、低价格的粗放型路径;出口规模的高增长付出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入世后大量低质量的企业开始出口,造成中国总体出口产品质量水平有所下降;尽管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很大,但真正由国内贡献的技术含量不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靠近中下游环节;服务贸易逆差严重等。实际上究竟何为贸易强国?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贸易强国的外在表征是非常多层次的,其中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拥有国际经济治理话语权应当是贸易强国非常重要的内在支撑,然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均与先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庞大的贸易规模与不平衡还招致许多国家集中针对中国展开有针对性的贸易保护,甚至引发严重的贸易冲突与争端,2001-2018年全球针对中国出口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数高达1119起,排名居于第一位,为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埋下了不小的祸患。

为了解决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开始从战略高度重视贸易强国的建设,提出要在2030年初步实现贸易强国的目标。除了制定措施切实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强化产品质量意识和标准等,中国更加注重对领先技术的开发与掌握。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继续发挥出口优势、巩固“量”的扩张的同时,已经着手多管齐下、推动“质”的提高,包括鼓励先进设备、零部件及技术进口实现学习吸收再创新;另一方面出台《中国制造202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激励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创新,为贸易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诸边、区域和双边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充分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承担大国责任,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引领新型区域经贸合作。

(三)贸易政策体系从边界措施到规制融合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功能是调剂余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因此贸易政策体系基本是由关税、配额、许可证等边界措施组成,而且整个贸易政策体系充满了浓厚的计划色彩,贸易政策措施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政策体系与WTO规则逐步接轨,关于进出口商品管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等措施不断规范,还扩充了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新内容;此外,随着贸易与投资联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国民经济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外资政策和产业政策中与对外贸易政策的协同交叉也逐渐增多。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随着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的发起与进行,贸易政策措施日益触及国内监管与规制,由此关于新的贸易规则主导权的争夺也越发激烈。这表明,从世界范围来看,以关税为代表的“第一代贸易政策”已基本受到约束和削减,而以投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保、劳工、数字贸易、国有企业等议题为代表的“边界内措施”(即“第二代贸易政策”)正在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重点。发达国家是这些高标准、新

规则的主要倡导者,特别强调为国际生产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创造一个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营商环境公开透明、法律体系科学健全的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仍然以边界措施为核心,尽管已经看到诸如贸易便利化、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电子商务等议题先行改革试验的成效(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内取得的制度创新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但是总的来说,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明显。新议题的全面融合需要在对其经济效应进行科学准确评估的基础上谨慎地进行,而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国内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最重要的是其可能会触及一些改革的“深水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件的部署,目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推进,新一代贸易政策的顶层设计囊括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框架之下,主要是在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的基础上,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或自由贸易港对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进行风险测试与压力测试,最终推动贸易新议题在中国贸易政策体系中落地。

(四)贸易发展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

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出口创汇,从而解决“外汇短缺”的瓶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落后,国家主要通过强大的行政计划指令出口初级产品和能源资源实现创汇,此时的贸易发展动能是建立在政府的意愿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的(傅朝阳、陈煜,2006)。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推进,中国市场化步伐不断加快,工业生产能力逐渐提高,中国开始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转移,出口得以飞速增长,此时的贸易发展动能转换为丰裕要素——劳动力。入世后中国继续通过加工贸易从事世界生产分工的加工装配环节,参与国际贸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释放与发挥,中国进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贸易大国。然而,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依托传统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越发令人担忧,结果这一粗放式贸易发展方式的弊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充分

暴露,中国行业与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成为重要特征(吕越等,2018)。因此,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必须加快培育国际竞争综合新优势。

近年来,可以看到中国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向和努力。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2017年十九大指出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以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可以为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提供土壤,而国家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改革也一定会对贸易发展动能产生积极的溢出作用。总的来说,当下中国贸易发展动能转换升级的思路是在促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引导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利用信息技术培育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依托“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主的全球或区域价值链,扩大服务贸易升级和外资开放,最终实现贸易发展动能的综合性、多元化和可持续力。

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与挑战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走过的70年征程光荣而又艰辛,展望未来,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中国必须对未来对外贸易发展的前景与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

第一,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目前国家已经围绕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出台了多项战略部署和实施举措,但由于过往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质量意识不强、核心技术缺失等短板,当下承担对外贸易活动的微观企业的战略意识和能力可否被激活变得十分关键。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深刻警示中国企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如芯片)的重要性,从而在复杂环境中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会对中国实施的技术打压和封锁。因此,自主研发获取核心技术才是跳脱受制于人的窘境、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王道。从政府层面来讲,有必要加大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法,全力扶持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创新,尽快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第二,关于新贸易产品与业态。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促进传统的生产制造模式和商业组织模式发生巨大变革。传统产品中越来越多地被注入新概念和新技术,不断推陈出新,适应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消费升级需求;新产品被不断开发问世,尤其是数字化产品成为未来发展的潮流;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商业模式和跨国公司的组织方式。在飞速变化的科技变革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已经进入一个非凡创新的数字时代,中国的贸易发展必须在理念、技术、环境与制度上适应乃至引领这些变化。

第三,关于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传统的贸易政策由市场准入为核心的边界措施组成,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奖出限入”,即对幼稚产业、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最终产品施加严格的准入壁垒以及鼓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实践即是如此。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中间品进口自由化已成为实现产业和价值链升级的一条重要路径;同时,贸易政策已经明显向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第二代贸易政策转变,后者强调国家间的规制融合与监管一致化,而诸如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公共目标在各国之间是很难达成一致的。因此,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互动更为复杂,如果两者缺乏有效的政策统筹与协调机制,可能导致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第四,关于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所掌控的。尽管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的兴起与壮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但总的来说其制定规则、谈判和结盟的能力依然有限,其内部分歧有时也难以调和。中国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经验相对不足,尤其是在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设定国际经贸新议题和新规则以及管理利益联盟方面亟待提高。对此,中国应一方面继续坚定维护世界多

边贸易体制并积极参与WTO改革,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同时不断完善金砖国家峰会、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努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

- ① 根据 WTO-UNCTAD-ITC Annual Trade in Services Dataset(<https://data.wto.org>)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 ② 根据 WTO-UNCTAD-ITC Annual Trade in Services Dataset(<https://data.wto.org>)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 ③ 根据 WTO-OECD的TiVA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 ④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2011)。
- ⑥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
- ⑦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016)。
- ⑧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2]傅朝阳、陈煜:《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1980-2000》,《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1期。
- [3]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4]李坤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评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
- [5]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
- [6]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
- [7]裴长洪:《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8]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 [9]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史》(下卷),中国商务出版社2016年版。
- [10]沈坤荣、马俊:《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11]盛斌、吕越:《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2001-2010年中国微观贸易数据》,《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11期。

[12]盛斌、钱学锋、黄玖立、东艳:《入世十年转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5期。

[13]施炳展:《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测度与事实》,《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期。

[14]屠新泉、娄承蓉:《改革开放40年: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的演变》,《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

[15]吴家煌:《世界主要国家关税政策与措施》,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余森杰、张睿:《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的准确衡量:挑战与解决方法》,《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2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8-1965 中华人民

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18]Amiti, M., & Freund, C., An Anatomy of China's Trade Growt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628, 2008.

[19]Antras, P., & Chor, D., On the Measurement of Upstreamness and Downstreamnes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2549, 2017.

[20]Feenstra, R. C., & Wei, S. J., Introduction to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716, 2009.

[21]Meng, B., Xiao, H., Ye, J., & Li, S.,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Truly Global? A New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Measure of Trade in Value-added. IDE Discussion Paper, No. 736, 2018.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Review and Prospect

Sheng Bin Wei Fang

Abstract: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achieved great achievements marked by the increased trade volume, upgraded structur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market players and the expanded market. China has become a veritable world manufacturing and trade center. China's foreign trade policy focus has shifted from state-controlled protection trade to quality-oriented opening-up on all fronts through gradual trade liberaliz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has presented four transformatio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rategy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trade balance, that of the target from trading quantity to trading quality, that of the policy system from border measures to regulatory convergence, and that of the drive force from factor advantages to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need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large trader to a strong trader, develop new trade product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trade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have a greater say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Key words: foreign trade; trade liberalization; opening-up on all fronts; trading power